

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演进的影响 ——基于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的视角

张捷, 张媛媛, 莫扬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文章从“制造—服务”国际分工的视角探讨了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迟滞需求方面的原因,提出了以下理论假说:在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下,出口贸易的过度发展将导致对服务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收入效应和关联效应,使产业结构落入“低水平过度制造业化”的陷阱。文章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提取各经济变量的独立影响,为上述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文章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加快工业化进程,但可能抑制产业结构向服务化的演进。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有必要转变发展模式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关键词:国际贸易;产业结构;恩格尔定理;服务化

中图分类号:F062.9;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3)06-0016-12

一、产业结构演进的“中国悖论”

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和国际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生产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上,第一产业的比重将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在工业化前期先上升,到工业化后期逐渐下降,经历一个倒“U”形变化(Mao和Yao, 2010; 徐朝阳, 2010),第三产业的占比则将持续上升,最终占据绝对优势,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形象地说,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经济,三次产业比重的一般演变规律是从“一、二、三”(或“一、三、二”)经过“二、三、一”(或“二、一、三”)阶段,最后稳定在“三、二、一”的状态。但中国的情况似乎不符合上述一般性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明显改善,从改革开放前的“二、一、三”结构转变为“二、三、一”结构。但自1985年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一产业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稳定在

收稿日期:2013-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危机时代全球分工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09AZD01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研究》(08JZD0014)

作者简介:张捷(1953—),男,重庆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媛媛(1985—),女,河南驻马店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莫扬(1972—),男,湖南益阳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二、三、一”状态已经持续了 1/4 多世纪。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至今维持在近 50% 的高位,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虽然呈上升趋势,但这一上升主要来自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的下降。2002 年以来,随着第一产业比重降幅趋缓,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未能延续赶超第二产业的势头。从世界各国一般规律来看,人均收入在 3 500 美元的阶段,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为 60% 左右,就业比例为 65% 左右。中国 2010 年人均收入 4 270 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却只有 43.1%,就业比例仅为 34.6%,与均值分别相差约 20 个和 30 个百分点。许多学者(江小涓、李辉,2004;程大中,2004,2008a;李勇坚、夏杰长,2009)认为,无论与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国际标准模式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均滞后,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有悖于一般规律。

我们认为,中国产业结构明显滞后是由产业结构演进停滞所引起。为了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动幅度,图 1 显示了 1979—2010 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转型系数。^①从趋势线可见,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存在着明显的收敛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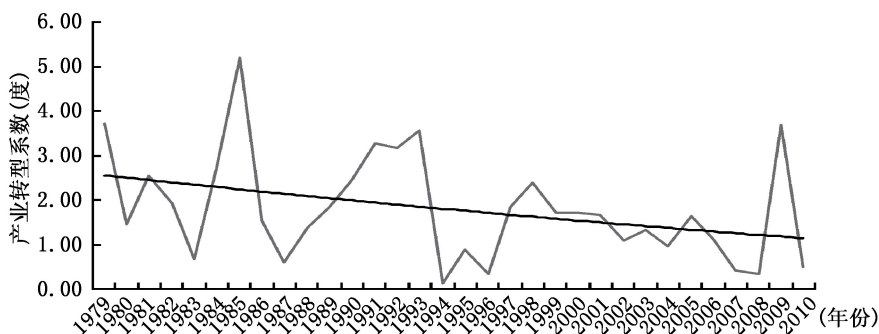


图 1 1979—2010 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系数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对于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占比过低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第一产业占比的下降空间已经不大,产业结构的演进将主要通过第三产业挤占第二产业的比重来实现。我们通过计算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产值对比敏感系数——人均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变动率与第二产业比重变动率之商——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服务化的变动程度,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初期,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产值对比敏感系数急速上升,这是对计划经济时期人为压制第三产业发展的一种反弹,但该系数在 1982 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进入低水平变动阶段,2003 年至今进一步陷入胶着状态。所以,目前产业结构演进陷入停滞,关键在于第三产业挤占第二产业比重开始趋缓,使第三产业未能顺利超越第二产业。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相对停滞是要素禀赋结构相对固化的

结果。这种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但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禀赋(相对稀缺性及其价格)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而由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刚性,这些变化却未能传递到产业结构上去。本文试图探讨:何种原因迟滞了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在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还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

二、文献评析与理论假说

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背离国际经验的原因,国内学者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解释: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郭克莎,1999);统计和核算方面的问题(许宪春,2000,2004);“成本病”问题(程大中,2008b);低消费率和低城市化率的影响;行业行政垄断等体制和政策问题;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等问题(江小娟、李辉,2004;江小涓,2011);内部化现象严重,专业化分工不足问题(高传胜等,2008)等。这些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也留下了一些疑惑,其中最大的疑惑是它们都未清晰地解释为何在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却依然保持快速增长。

我们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视角来考察这一现象。因为国际分工视角与立足于国内原因的解释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国际分工视角不仅能够解释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还能说明服务业滞后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故对产业结构演变的“中国悖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钱纳里等(1989)认为需求因素是各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同的主要原因,而国际贸易及其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发展战略则是各国结构演变差异的主要原因。依据不同的发展战略和贸易模式,钱纳里等(1989)得出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经济结构转变速度较快,国内外产业关联度较高,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的结论。钱纳里等关于需求是各国产业结构趋同主因的思想很深刻,但这里的需求主要是指国内需求,如果把需求因素与贸易因素结合起来,则贸易所产生的外需应当是各国产业结构趋异的重要原因。另外,钱纳里等人始终把研究重点放在工业化的过程上,而对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的问题则很少涉及。

Kaldor(1981)和 Thirlwall(1979)认为,国际分工和经济增长通过内生技术变化相互联系。他们指出,收入水平和贸易的价格弹性影响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分工模式又引起需求扩张,需求扩张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生产率提升,生产率提升反过来又通过循环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较高贸易收入弹性的国际分工模式比其他模式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促进产业结构转变。

但也有学者提出,国际贸易是否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是不确定的,专业化分工并非必然与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相联系。Matsuyama(1992)指出,国际分工的结构变化受发展水平的制约,比较优势可能是内生决定的。一个典型的

例子是,国际分工可能导致一些国家长期专业化于某些增长潜力低的生产部门,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Amable(2000)也认为,并非国际贸易的每一种效应都对经济增长有益,如果国际分工导致一国脱离研发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依赖从外国进口这类产品,那么该国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可能比在封闭条件下还要慢。Fagerberg(2000)则对专业化于先进技术行业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高增长率的理论表示了质疑。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样本国的结构变化普遍而言并没有推动生产率提高,致力于当代技术进步最快的部门(如电子产业)的国家并没有出现比其他国家更快的生产率增长。但该结论并不意味着与结构变化相关的电子信息革命对一定时期的生产率提高没有作用。首先,与信息革命相关的电子设备行业已经历比其他行业更快的生产率增长,意味着在这些部门领先的国家拥有“结构红利”;其次,信息革命对于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如东亚)比在全球更为显著。

如果撇开投资和技术变化等供给因素,仅从需求方面来看,国际分工主要通过贸易途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国际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又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即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外部需求和规模经济带动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发展。间接效应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收入效应,即国际分工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比例会减少,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比重会增加,结果是服务业的收入需求弹性变得大于制造业。因此,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更快增长,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型(Fisher, 1933、1939; Clark, 1940; Fuchs, 1968)。二是关联效应,即国际贸易促使一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并通过产业间的前后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最常见的是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产生中间需求,从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Francois, 1990; Rowthorn 和 Ramaswamy, 1999; Koldt, 2000)。三是替代效应(为区别直接替代效应,在此称为挤出效应)。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国际贸易会提高富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在一国经济实现了潜在增长率(即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通过国际贸易大力推动本国优势产业发展,要素收入差距会引起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导致优势产业挤占劣势产业的资源,尤其是对可贸易性弱的服务业的发展起到挤出作用。

另一种替代效应来自分工本身(属于直接效应)。教科书上论及的国际分工往往是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或不同制成品之间的分工,或同一制成品内部不同零部件及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但几乎无人提及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国际分工。^②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对一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取决

于以下因素的综合:(1)贸易所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孰大孰小;(2)间接效应中收入效应、关联效应与挤出效应孰强孰弱。对于专业化于制造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以上因素的综合在很大程度上与贸易依存度有关。如果贸易依存度过高,工业品出口将直接带动制造业迅速增长,同时贸易对本国服务业产生的替代效应可能超过收入效应和关联效应,从而服务业产出比重相对于制造业出现萎缩。因此,在制造—服务国际分工体系中,专业化于制造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过度依赖出口,其产业结构演进就可能被锁入“低水平过度制造业化”^③的陷阱之中。而如果出口依存度适度,贸易对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收入效应和关联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则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可能随经济发展逐步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不过,专业化于制造业的国家在贸易依存度过高时,虽然其服务业的发展会受到抑制,但并不妨碍该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服务业,服务业是容易患上“成本病”的“停滞部门”(Baumol,1967、1985)。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受需求和产业关联的约束,服务业滞后的国家不可能通过“过度制造业化”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在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下,“过度制造业化”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却是可能的,因为国内生产性和生活性的服务需求可以由国外服务提供商来满足,而国外对制成品的消费需求正好可以消化该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工业品和服务品在可贸易性、劳动生产率、需求的收入和价格弹性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贸易均衡极难实现,在制造—服务分工中专业化于制造业的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终究难以持续。

于是,我们提出这样一种假说,即对于新兴工业经济体来说,当对外贸易适度发展时,它不仅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可以通过收入效应和关联效应来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但在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下,新兴工业经济体出口贸易的过度发展则将导致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挤出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和关联效应,对外贸易在拉动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将抑制服务业的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低水平“锁定”^④,抑制产业结构及时向服务化转型,因此,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恶化,最终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

三、经验证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国际分工对产业结构演进的间接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再影响产业结构这一路径来实现的。鉴于这种多因素之间的因果循环关系,本文拟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提取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等经济变量对服务业发展的独立影响。联立方程模型设定如下:

$$\begin{cases} EG = \alpha_0 + \alpha_1 TD + \alpha_2 IS + \alpha_3 INV + \alpha_4 CG + \alpha_5 GE + \alpha_6 UR(-1) + v_1 & (1) \end{cases}$$

$$\begin{cases} TD = \beta_0 + \beta_1 EG + \beta_2 IS + \beta_3 ER + \beta_4 FDI + v_2 & (2) \end{cases}$$

$$\begin{cases} IS = \gamma_0 + \gamma_1 TD + \gamma_2 EG + \gamma_3 TD^2 + \gamma_4 CS + \gamma_5 PT + \gamma_6 UR + v_3 & (3) \end{cases}$$

变量说明见表 1,我们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IS)来反映产业结构向后工业化演进的趋势,当 $0 < IS \leq 1$ 时,说明第三产业增加值未能超过第二产业,而当 $IS > 1$ 时,则说明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经济主导产业。

表 1 变量说明和数据选取

变 量		定 义	数据选取
被解释变量	EG	经济增长	GDP 年增长率
	TD	对外贸易	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
	IS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解释变量	INV	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
	CG	消费	居民消费年增长率
	GE	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年增长率
	ER	汇率	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美元)
	FDI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占 GDP 比重
	CS	消费结构	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比重
	PT	贸易结构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进出口额之比
	UR	城市化率	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联立方程模型中式(1)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体现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投资、消费和城镇化等变量为控制变量;式(2)中对外贸易为被解释变量,说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主要是出口)的影响,汇率和外商投资为控制变量;式(3)以产业结构变动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其中引入对外贸易的二次项,意在说明贸易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非线性影响,预测贸易出口对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倒“U”形趋势。

下面我们选取《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9 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在分析之前先对联立方程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

(二)模型设定检验与工具变量选择

模型中有 3 个方程,3 个内生变量,是完整的联立方程模型。模型中的各变量都是平稳的比例数据,避免了伪回归问题。我们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的可识别性进行验证。从秩条件看,所有方程的被斥变量系数阵的秩均为 2,等于方程总数-1,满足秩条件,说明三个方程皆可识别;从阶条件看,各方程的被斥变量数目均大于(方程个数-1)=2,说明各方程都是过度识别的。EG、TD 和 IS 互为解释变量,造成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并使方程之间的随机扰动项相关,很可能产生联立性偏误(Simultaneity Bias)。当各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同期相关时,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不再有效,因此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和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参数,以克服联立性偏误。再

者,联立性的存在反过来说明设置联立方程进行回归是必要的,否则完全可以对单个方程进行回归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本文的联立方程由多个多元回归模型组成,且单一方程至少存在两个内生变量,因此必须为每一个内生变量选择独立的工具变量,才能保证回归参数具有一致性。式(1)的 TD 和 IS 均是内生变量,通过 OLS 辅助回归分别确定各自的工具变量。

从回归结果来看,与 TD 对应的工具变量为 CG、GE、ER、FDI、UR 与常数,与 IS 对应的工具变量为 CG 与常数。我们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选择的工具变量向量是否恰当,检验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用 OLS 方法生成内生变量 TD 和 IS 的拟合值和残差序列;第二步把回归的拟合值和残差序列带入原方程替代内生变量进行回归,如果残差项不显著,则说明工具变量是恰当的。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项的系数均不能显著区别于 0,说明为式(1)选定的工具变量是恰当的。依据相同步骤选择式(2)和式(3)的工具变量,确定内生变量 EG 的工具变量为 INV、CG 和常数,IS 的工具变量为 CG 和常数,TD²的工具变量为 FDI、CS、CG 和常数。

(三)实证结果

本文运用 3SLS 和 SUR 进行回归以克服联立性偏误,通过 GAUSS9.0 编程实现,SUR 回归结果明显优于 3SLS,为节约篇幅,仅报告 SUR 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SUR 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EG	TD	IS
C	-0.54(-0.11)	-7.09(-1.38)	0.7195*** (4.80)
GE		0.29*** (4.43)	-0.00339*** (-3.86)
TD	0.368*** (3.67)		-0.0046*** (-6.90)
TD(-1)		0.4521*** (5.37)	0.0320*** (5.17)
TD(-2)			0.0065(2.15)
TD ²			-0.0006*** (-5.20)
IS	14.90* (1.79)	-7.71(-0.986)	
INV	0.0775*** (2.68)		
CG	0.8704*** (13.55)		
GE	-0.0268(-0.41)		
ER		4.64*** (6.21)	
FDI		-4.07*** (-5.56)	
CS(-1)			0.008(1.35)
PT			-0.1046*** (-4.27)
UR			-0.0102(-1.08)
R ²	0.95	0.94	0.95
D W 统计值	2.17	1.61	2.15
JB 统计值(残差)	0.653638	2.250824	0.489577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残差诊断检验,三个方程残差项的 R² 均很高,拟合很好,DW 统计值

接近 2,不存在明显的一阶自相关;JB 统计值小,说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综合来看,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四)对检验结果的解释

1.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

从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来看,对外贸易(T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估计系数 0.368)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符合预期和现实。产业结构演进(IS)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为正(14.9),但显著性水平高达 10%,表明产业结构服务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假设置信度较低,这与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来驱动不无关系。而且,在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下,工业增长对服务业产生的部分中间需求可以通过服务进口来解决,因此国内服务业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验证了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中国悖论”。

对产业结构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演进有较小的负向影响(系数为-0.00339),并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意味着:由于过分依赖出口贸易,我国经济增长对服务业的收入效应和关联效应被挤出效应所抵消,服务业发展受到挤压(赵永亮、张捷,2011)。若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亦难以自发实现经济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2. 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演进

从对外贸易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演进(IS)对出口依存度(TD)的影响为负(系数为-7.71),但未通过检验。我国出口贸易的约 90%为工业制成品,产业结构服务化会降低制成品出口比重,导致出口依存度下降,因此 IS 与 TD 的关系为负符合预期。但由于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曲折反复而难获进展,出口依存度居高不下,该系数未能通过检验也符合中国的现实。

从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来看,出口依存度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为正(系数为 0.0320),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加入出口依存度的二次项(TD^2)之后的回归结果表明, TD^2 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为负(系数为-0.0006),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有力地证明了出口依存度对产业结构演进存在一种倒“U”形的动态影响,即存在一个临界值,在未达到临界值时,出口促进产业结构演进;达到临界值以后,出口依存度继续提高反而阻碍产业结构演进。通过计算,出口依存度的临界值为 26.67%(=0.0320/(2×0.0006)),跨越临界值大约在 2003 年,即中国加入 WTO 的第二年,该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出现了 34.7%的大幅增长。入世使中国更加彻底地贯彻了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获得了充分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结果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由此在拉动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上升的同时导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受到压制,从而改变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第三产业赶超第二

产业的结构演变趋势。

3. 贸易结构等变量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

从贸易结构(PT)来看,作为制造—服务分工典型形态的加工贸易比重对产业结构演进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系数为-0.1046)。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与国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度极低,其劳动密集型特征又占用了大量劳动力资源,是典型的挤出效应大于关联效应的贸易形态。21 世纪以来,快速增长的加工贸易占据了我国外贸半壁江山,强化了对对外贸易对服务业的挤出效应,这进一步解释了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演进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

另外,两个工具变量消费结构(CS)和城市化(UR)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均未通过检验。这也许与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和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居民的服务性消费需求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有关。

综上所述,经验证据表明:作为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的主角之一,中国以制成品和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增长虽然促进了国内工业化进程,但对产业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经济演进却产生了阻滞影响,这种影响在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中国入世以来日益显著。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于加速实现工业化是一种有效的战略,但当工业化进入成熟期,世界经济格局也因金融危机而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这一发展模式需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可能导致中国产业结构落入“低水平过度制造业化”的陷阱,从而难以启动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进程。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和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分工催生出制造—服务的国际分工形态。总体上看,制造—服务国际分工更多地是由发达经济体所主导的国际分工,但也与新兴经济体推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制造—服务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全球最大加工制造基地的重要角色,从而工业化进程得以大大加速,但同时也付出了较大代价。除了对资源、环境的透支外,另一个代价是经济结构的扭曲。过度依赖制成品出口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使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缓慢,结构扭曲反过来又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制造业产能过剩,诱使出口依存度进一步提高。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和消费需求的萎缩倒逼新兴经济体“去产能化”。对“世界工厂”中国来说,要避免在去产能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战略选择。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8 000 美元,中心城市的人均收入更是高达 10 000 美元以上,中国沿海地区率先向后工业经济转型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向后工业经济转型意味着必须与制造—服务国际分

工适度脱钩,降低出口依存度,努力扩大内需,更多地发展与国内消费息息相关的服务业。站在政府的角度,服务业发展优先领域不是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这些领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驱动),而是要大力发展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性住房等准公共服务行业,以满足居民对核心消费品的需求,解除其后顾之忧,通过准公共服务来带动私人消费。发展服务业的关键是要建立起服务型政府,打破行政垄断,开放重要服务部门,在准公共服务部门中建立起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此外,发展服务业还需要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提高国民素质,使滞留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劳动力能够顺利向服务业转移。总之,服务业主要是人对人而非人对物的生产活动,是知识更加密集、人力资本更加密集和制度更加敏感的产业,没有好的制度环境和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仅靠政府干预和大量硬件投资是难以发展起来的。因此,实现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结构转型,其基本前提是实现政府转型、制度转型和提高国民素质。

注释:

①产业结构转型系数(ITC)的计算公式为($ITC = \theta$):

$$\theta = \arccos \left(\frac{\sum_{i=1}^n S_i(t_1) \times S_i(t_2)}{\sqrt{\sum_{i=1}^n S_i(t_1)^2 \times \sum_{i=1}^n S_i(t_2)^2}} \right)$$

其中, $S_i(t_k)$ 表示在 t_k 年第 i 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对应于 t_1 和 t_2 年($t_1 < t_2$)的两个空间向量 $S(t_1)$ 和 $S(t_2)$ 之间的夹角 θ 即为在时间区间 $[t_1, t_2]$ 内的产业转型系数, θ 的最大值为90度(邓伟根,2006)。

②“制造—服务”分工的形成原因有:(1)经济发展的结构落差。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服务化的趋势下,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制造业则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主导产业。(2)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产业链分工导致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的分离。由于失去优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逐渐退出制造环节,通过直接投资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专注于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营销等环节,使生产性服务业逐步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3)各国文化、制度和发展战略的差异(胡超、张捷,2010)。

③“低水平过度制造业化”是指在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比长期居高不下,制造业的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低下但整体产能过剩,不得不严重依赖出口,导致产业结构迟迟不能向服务经济演进的现象。

④张捷和林新孟(2012)采用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在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下,新兴经济体出口贸易的过度发展将导致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替代效应,延缓结构服务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2):18—32.
- [2]程大中.中国经济正在趋向服务化吗?——基于服务业产出、就业、消费和贸易的统计分析[J].统计研究,2008a,(9):36—43.
- [3]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存在“成本病”问题吗?[J].财贸经济,2008b,(12):109—115.
- [4]邓伟根.产业转型:经验、问题与策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 [5]高传胜,汪德华,李善同.经济服务化的世界趋势与中国悖论:基于WDI数据的现代实

- 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08, (3): 110—116.
- [6]郭克莎. 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偏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及调整思路[J]. 经济研究, 1999, (9): 15—21.
- [7]黄少军.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8]胡超, 张捷. “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演进及可持续性分析[J].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10, (2): 4—11.
- [9]江小涓, 李辉. 服务业与中国经济: 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J]. 经济研究, 2004, (1): 4—15.
- [10]江小涓. 服务业增长: 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J]. 经济研究, 2011, (4): 4—14.
- [11]李勇坚, 夏杰长. 我国经济服务化的演变与判断——基于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J]. 财贸经济, 2009, (11): 96—103.
- [12]钱纳里, 鲁宾逊, 塞尔奎因.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 [13]许宪春. 90年代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J]. 管理世界, 2000, (6): 73—77.
- [14]许宪春. 中国服务业核算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4, (3): 20—27.
- [15]徐朝阳. 工业化与后工业化: “倒U型”产业结构变迁[J]. 世界经济, 2010, (12): 67—88.
- [16]张捷, 林新孟. 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J]. 产经评论, 2012, (3): 41—51.
- [17]赵永亮, 张捷. 工业与服务业非均衡发展研究——服务业会走向 Baumol 陷阱吗[J]. 财贸经济, 2011, (6): 100—106.
- [18]Amable B.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growth[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4): 413—431.
- [19]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 [20]Baumol W J, Blackman S B, Wolff E N. 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 Asymptotic stagnancy and new evi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4): 806—817.
- [21]Clark C.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 London: Macmillan, 1940.
- [22]Fagerberg J.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4): 393—411.
- [23]Fisher A G B. 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J]. Economic Journal, 1933, 43(171): 379—389.
- [24]Fisher A G B. Productio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J]. The Economic Record, 1939, 15(1): 24—38.
- [25]Francois J F. Producer services, scal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0, 42(4): 715—729.
- [26]Fuchs V. The service econom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27]Kaldor N. The rol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echnical progress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e Appliquee, 1981, 34(6): 593—617.
- [28]Klodt H. Structural change towards services: The German experience[R].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GS Discussion Paper, 2000.
- [29]Mao R, Yao. Structural change in an open economy[R].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 No. c2010010, 2010.
- [30]Matsuyama K.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rowth

-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2): 317—334.
- [31] Rowthorn R, Ramaswamy R. Growth, trade and deindustrialization[J]. *IMF Staff Papers*, 1999, 46(1): 18—41.
- [32] Szirmai A. Industrialisation as an engine of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50—2005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2, 23(4): 406—420.
- [33] Thirlwall A P.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t as an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growth rate differences[J].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1979, 32(128): 45—53.

On 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wards Tertiar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service Division of Labor

ZHANG Jie, ZHANG Yuan-yuan, MO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demand-based reasons for the stagnant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service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poses the hypothesis that over-development of export trade will lead to greater crowding-out effect on service sector than its income effect and correlative effect in consi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service division of labor, thereby catch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trap of over-industrialization at a low level. It employs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extract the independent effects of each economic variable and provid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hypothesis above-mentioned. It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export-led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ha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t will probably inhibit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industrialization to tertiarization.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change its development patter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ial structure; Engel' law; tertiarization

(责任编辑 周一叶)